

「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下的亞太安全 — 中華民國應有之作為

王 定 士

(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副教授)

摘 要

隨著蘇聯的解體，冷戰時期的兩極格局已不復存在，大國之間的關係也進行了相對的調整。在新的國際格局中，「中」俄兩大國基於遏制北約的東擴和防止美日安保條約的圍堵，雙方除了極力倡導多極的國際體系外，並進一步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冀由強化雙邊的多層面關係，來共同對抗美國的獨霸局面。「中」俄關係的持續加溫，特別是雙方軍事交流層面的不斷擴大，已使中共的軍事現代化進程向前邁進了一大步，近年來中共軍力的大幅提升已對亞太安全格局造成了莫大的衝擊，首當其衝的當屬台海安全問題，兩岸的軍力對比亦已逐漸失衡。面對這個巨大的轉變，台北方面宜採取更務實且富前瞻性的因應措施，首先，應透過各種國際多邊主義的途徑，尋求以集體的力量來確保台灣自身的安全；其次，加強台俄之間的非軍事交流，提升雙邊在經貿和科技領域的合作層次；第三，發展兩岸「信心建立措施」(C B M s)，以消除彼此的疑慮、降低雙方的敵意，從而避免因誤解而造成緊張對立或引發不必要的衝突；最後，在中共仍不放棄對台使用武力的前提下，台北應繼續維持一定的自衛力量，建立一支具有嚇阻作用的武力。

壹、前言

隨著蘇聯的解體，冷戰的兩極格局也不復見，大國之間的關係也因應時勢而進行了相對調整。大體說來，目前的國際局勢可說是「單極加多極」(杭廷頓語)或「一超多強」的格局，各國在不同領域彼此合縱連橫，冷戰時期敵我分明的態勢在後冷戰時期已不明顯。儘管冷戰的陰影散去，但世界和平並未真正到來，以往為兩極對峙所掩蓋的民族衝突、宗教矛盾，以及領土糾紛等問題遂迸發出來，成為今日國際社會動盪的根源。有學者認為影響二十一世紀國際安全環境的諸多因素中，有五點是最重要的：¹

第一、國際經濟：當前國際政治出現的一些新變化，同國際經濟長期以來的不平衡發展密切相關。未來國際安全形勢的走向也要取決於三大經濟體—美國、歐洲、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

第二、大國關係：當前的大國關係有兩個突出的特點，首先是力量對比失衡，其次是美國單極勢力膨脹，兩者密切相關。以亞太地區而言，經濟上彼此合作的潛力仍大，但在政治上，則可能形成一個以美日「中」不等邊三角為核心、關係相對穩定、但重心向美國傾斜的大國關係格局。

第三、民族分離主義：冷戰後在蘇聯週邊和東歐地區出現了一股民族分離主義的浪潮，這股浪潮受到南斯拉夫聯邦解體的鼓舞，正在向世界其他地區蔓延，成為許多國家內政上的隱憂。其中人們記憶猶新的，當為去年發生在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危機」。

第四、軍事安全：冷戰結束後，雖然經濟在綜合國力競賽中的地位上升，經濟安全的議題突顯，但軍事在國際政治和國家安全中的重要性並未減弱。世界各國在規模裁軍的同時，加快了質量建軍的步

1. 凌虛風，〈什麼因素影響二十一世紀國際安全環境〉，《中國評論》，2000年2月號，頁19-20。

伐，故一個以現代經濟實力為基礎，在高新技術推動下的新軍事變革正在重塑國際軍事實力對比，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未來國家安全的走勢。

第五、周邊熱點：如亞太地區，雖然該地區近年來經濟發展較快、政治相對比較穩定，但仍潛伏著足以危害區域和平與穩定的地區衝突引爆點。從日俄的北方四島之爭、日韓的竹島之爭、朝鮮半島局勢、「中」日的釣魚台列嶼之爭，以及台海兩岸的對峙和南中國海的爭議，由於這些爭端部分涉及到中共政權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故中共是直接的當事者，一旦這些衝突點被引爆，它很難不被捲入其中。

有了這種對國際安全環境的認知之後，就不可避免地要牽涉到「中」、美、日、俄等國的多邊互動了。目前擔負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的國家當然非美國莫屬，它在失去唯一的競爭對手蘇聯後，已成為僅有的超級大國，並極力防止任何有意圖或有潛力的國家崛起與其爭霸；而根據美國歷年來發表的國防或軍事安全報告，在二十一世紀最有可能、潛力和意圖與美國一較長短的國家首推中共與俄羅斯，²故為了阻擋中共的崛起和俄國的復興，美國可說是煞費苦心、多管其下，採用軟硬兼施的手段來盡力維護其超強地位，構建其主導的單極世界；而極力倡導多極化世界的俄國和中共也有所警覺而加強合作，經過數年的積極交往，終於在 1996 年 4 月締結了「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以一種迥異於冷戰時代軍事同盟關係的「新型態國際關係」來重新定位彼此。近年來，「中」俄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在國際事務上的分歧時有所聞，換句話說，「中」俄在諸多議題上有共識，

2. 此種說法首見於 1997 年 5 月美國國防部發表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1998 年 2 月美國國防部發表了〈國防報告〉，報告認為從現在起至 2015 年，美國處於一個「戰略機遇期」，其根本戰略目標就是阻止在全球特別是在歐亞大陸出現能對美國霸權構成挑戰的大國或大國集團，而中共和俄國有可能在 2015 年後成為美國的潛在對手。請見王仲春，〈二十一世紀中國：從容應對變化中的世界〉，《大公報》，2000 年 1 月 18 日，版 A4。

這也促成了雙邊關係的不斷加溫，特別是在軍事和戰略領域。今年2月11日，中共向俄羅斯購買兩艘現代級(sovremenny)軍艦之一的「杭州號」在另兩艘中共軍艦護衛下通過台灣海峽，前往東海艦隊的寧波基地。此舉不但引起台灣各界的高度關注，同時也引發了美國主流媒體的熱烈討論，伴隨著2月21日中共「一個中國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的發布，一時之間，台海的均勢問題，乃至於亞太的安全問題，再度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鑒於美國、西歐與日本同中共、俄國對抗的潛在局勢正逐步在各個領域成形，其中與我國相關者，當屬美國、日本與中共、俄國在亞太地區的對決。故本文的目的，即從「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軍事領域出發，透過對「中」俄軍事交流的分析，探討其對未來亞太安全格局和台海均勢可能造成的衝擊，並針對我國的因應對策及作為，提出拙見，以供有關單位決策之參考。

綜合近年來美國、俄羅斯、日本及大陸學界的觀點來看「中」俄關係的發展，其大體上均抱持著審慎樂觀的態度，即雙邊關係應該會循著目前的軌道繼續邁進，儘管存在著局部干擾，但均不足以影響發展的大方向。然而眾人均肯定了一點：「中」俄關係的發展對亞太地區權力平衡的影響極大，不論這種結果是正面抑或是負面的。隨著「中」俄夥伴關係的不斷加溫，有關「中」俄雙方擬結盟以抗美的傳聞也就甚囂塵上，且從美國在全球及亞太地區的動作頻頻來看，美國想必也感受到了此種漸增的壓力，故抱持著「寧信其有」的心態來應對之，而這種大國之間彼此猜忌、明爭暗鬥的狀態一旦浮上檯面，將是亞太地區安全的另一種隱憂，而這也是本文想要加以探討的主題之一。

另外，依筆者之見，「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建立和發展似乎受到新現實主義和地緣政治學思維的影響較大，而受到地緣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的影響較小，即使有，也不過是受到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趨勢的感染；從雙方始終停滯不前的經貿往來(不含軍火交易)就可看出，雙方交往的重心似乎仍在於政治和軍事領域，鑒

於地緣政治和歷史傳統上雙方是必然的對手，因而此種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可說是一種戰術上的組合，藉著改善和深化同對方的關係，以便在同西方交往時討價還價，故這種新型態的國際關係在某種程度上可說是「利益的結合」，而非「道義或友情的支持」。

貳、「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建立

一、「中」俄關係的發展與演變

19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由於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使得「中」蘇關係急劇惡化，特別是1969年的「珍寶島」事件，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第一次自家人兄弟鬩牆，故自戰爭結束之後，中共絕口不提存在著一個社會主義陣營，同時伴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爆發，連帶影響了中共領導人對國際局勢的看法，落實到外交政策上，就形成了「兩面開弓的反美反蘇」外交路線，這種強烈意識型態主導的外交政策使的中共在本時期的國際舞台上顯得相對較為孤立。然而70年代美國陷入越戰的泥沼，國力消耗甚多，故在同蘇聯的競爭中採取「退卻」的守勢，相反地蘇聯的氣焰則因此而扶搖直上。由於蘇聯已成為「中」美兩方的共同敵人，基於「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原則，「中」美雙方遂進行了接觸，經過了數年的交涉後，終於在1979年順利締結外交關係，構建了一條「聯美反蘇」的統一戰線；本時期的蘇聯對中共的政策始終如一，不但在雙方邊界部署重兵，且極力慫恿中共周邊的親蘇國家生事，故雙邊關係並無改善的跡象。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鄧小平的重新掌權，以及「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消除「三大障礙」³就成為恢復「中」蘇關係正常化的前提。時入80年代，莫斯科在改善「中」蘇雙邊關係上採取了主動

3. 「三大障礙」是指：蘇聯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蘇聯在「中」蘇邊境部署重兵、蘇聯武裝佔領阿富汗。

態度，1982年3月蘇聯領導人布里茲涅夫發表了「塔什干談話」，表示願意改善同中共的關係；1982年11月、1984年2月、1985年3月蘇聯領導人布里茲涅夫、安德洛波夫和契爾年柯相繼過世，中共也派使節團前往弔唁並出席葬禮，雙邊關係開始出現和緩；1987年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發表「海參崴講話」，向中共表達了善意。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戈巴契夫正式訪問中國大陸，與中共領導人鄧小平簽署聯合公報，雙邊恢復正常關係；⁴1991年5月15日至19日，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回訪蘇聯，雙方也簽署了聯合公報。

1991年12月蘇聯解體，但中共與蘇聯的親密關係並未因此結束，在當月的27日就同繼承蘇聯地位的俄羅斯建交，雙方並簽署了會談紀要，確定了雙方未來發展關係的基本原則：⁵(一)雙方關係建立在「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基礎上；(二)「中」俄關係的發展將以1989年和1991年中共與前蘇聯所簽署的兩項聯合聲明作為指導原則；(三)雙方均表示，願意承擔過去「中」蘇之間各項條約和協定所規定的義務，並享有應盡的權利。

從1992年起，「中」俄關係的發展歷經了數個階段且日趨緊密：
(一)1992年12月17日至19日，俄羅斯聯邦總統葉爾欽前往中國大陸進行為期三天的訪問，雙方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相互關係基礎的聯合聲明》，奠定雙邊關係基本架構，彼此「互視為友好國家」，將發展善鄰、友好與互惠合作關係。
(二)1994年9月2日至6日，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回訪俄國，雙方簽署聯合宣言和共同聲明，強調雙方互不使用武力對抗對方，雙邊關係由兩年前的「友好國家」進展為「建設性夥伴關係」。

4. 有關聯合公報的內容，請見謝益顯主編，《中國當代外交史 1949—1995》（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頁394-395。

5. 康四維，《後冷戰時期「中」俄關係演變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頁93-94。

- (三) 1996年4月24日至26日，俄總統葉爾欽二訪北京，同中共領導人簽署了聯合聲明，雙方宣布決心發展平等信任的「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雙邊關係又由兩年前的「建設性夥伴關係」上升為「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 (四) 1997年4月，江澤民二次回訪俄國，雙方簽署《「中」俄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表示雙方將本著夥伴關係的精神努力推動世界多極化的發展和國際新秩序的建立，同時主張，「和平共處五原則」及其他公認的國際法準則應成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基本準則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基礎。
- (五) 1997年11月，俄國總統葉爾欽三度訪問北京，雙方簽署了聯合聲明，表示「中」俄為建立多極世界和新的、更為完善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積極行動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贊同，對世紀之交的國際行事產生了健康的影響；雙方並認為下面各點對鞏固雙邊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發展意義重大：⁶1.加強信任、彼此尊重、互不干涉內政；2.兩國元首互訪、總理定期會晤、外長磋商機制有助於促進相互溝通和理解，擴大和深化兩國在各領域的全面合作；3.加強彼此在重大國際問題上的協調，使雙方能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國際合作與發展而共同努力。
- (六) 1998年11月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三訪莫斯科，雙方簽署了《「中」俄高級會晤結果聯合聲明》(世紀之交的「中」俄關係)，並認為應使和平與全面協調發展成為人類在新世紀應該遵循的主要原則。只有透過世界各國的共同努力和集體創造力，才能建立國際經濟和政治新秩序，真正確保所有國家的社會穩定，公正合理地維護各國人民的利益，而「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建立既是針對雙邊關係歷史和當今世界各國現實的深刻思考，也是基於就國際形勢發展和兩國合作前景所達成的共識。

6. 〈「中」俄聯合聲明〉，《中國外交》，1997年11月，頁31-32。

(七) 1999年11月俄總統葉爾欽四訪北京，雙方簽署聯合聲明和新聞公報，表示「中」俄雙方奉行的平等互信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方針，考慮到雙方無論是在建立多極、民主和公正的國際秩序等原則問題上，或則在迫切的具體國際問題上均有相同和相近的立場，願在上述有關方面加強合作。雙方在國際事務中的相互協作不針對第三國，旨在捍衛各自國家的根本利益，並鞏固亞太地區及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由此觀之，「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進展迅速，均已超越雙方與其他國家的交往，因而中共學者曾說，這種新型態的國家關係是「中」俄兩國人民為發展二十一世紀兩國關係作出的戰略關係所作出的最佳選擇，符合雙方的根本利益，具有堅實的政治基礎，集中體現在：⁷首先，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是在「中」俄關係全面、逐步發展的基礎上建立的；其次，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體現了「中」俄兩國戰略利益的趨同；第三、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是以一系列新型的國家關係準則作為指導原則的，這種夥伴關係是以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為準則，並建立在和平共處五原則及其它公認的國際法準則的基礎上；第四、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有一系列調解矛盾和衝突的機制作為保障，其主要表現 在政治合作機制、安全合作機制、經貿合作機制，以及國際問題磋商機制。

二、「中」俄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背景因素

冷戰結束後，「中」俄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戰略方面的關係都有別於冷戰時期的「中」蘇關係，主要原因在於蘇聯解體，國際格局面臨重整，因此當中共在與俄羅斯發展雙邊關係時，是從本身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戰略上的利益作現實的調整，以利於在後冷戰時期

7. 趙龍庚，〈「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邁向堅實之路〉，《現代國際關係》，1999年第5期，頁31-33。

的國際新格局中居於有利的位置，而此種「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依雙方的說法，既不是同盟，也不是針對第三國，而是在兩國相互關係中摒棄對抗，並為雙方在各個領域進行最廣泛的平等互利合作創造條件。⁸

隨著美國軍事和經濟力量獨大，以及北約勢力的東擴，再加上亞太地區美日安保同盟的擴張，在在使得雙方加強彼此的聯繫成為當務之急，即使被「中」俄視為唯一可與美國平起平坐、同台較勁的場域—聯合國，但在科索沃戰爭中卻喪失了它的功用。近年來，為因應美國霸權的威脅，「中」俄開始強化雙邊的安全關係，特別是軍事交流。故以下先從政治、經濟兩面向來剖析「中」俄締結「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及雙邊發展迅速的原因，而將軍事層面獨立成一節，並作為雙方關係發展的重點來探討。

(一) 追求安定的周邊環境

「中」俄兩國具有共同的發展目標，都希望兩國邊境的和平與安全，實現現代化。為此目的，雙方都在集中精力，深化本國的改革，發展民族經濟，因此需要穩定、安寧的周邊環境。

蘇聯解體後，在西方有北約的東擴，而在西南部則不斷發生宗教糾紛、武裝衝突，以及民族分離主義的滲透，故俄國地區安全面臨威嚇；中國大陸則飽受「藏獨」、「疆獨」等民族分離主義的侵擾。中國大陸是俄國東方最大的鄰國，而俄國則是中國大陸北部最強的、也是最大的鄰國，兩國擁有 4300 多公里的共同邊界，故雙方發展「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對保障兩國的國家安全以及國內改革和建設的順利推動具有重要的意義。

邊界問題曾是「中」蘇關係長期陷入緊張對抗的重要因素，雙方邊界談判從 1964 年後即處於停滯狀態，關於邊界問題的談判最早是從

8. 〈世紀之交的中俄關係〉(中俄高級會晤結果聯合聲明)，《中國外交》，1998 年 11 月，頁 17。

1986年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的「海參崴」演說開始，與此同時1987年「中」蘇副部長級的談判也持續進行，至前蘇聯末期，「中」蘇邊界除了黑瞎子島和阿巴該圖洲兩處尚待商榷外，其餘均已達成協議，解決了雙方邊境東段百分之九十七的地段，並在1991年5月16日簽署了《「中」蘇關於東段邊界的協定》，⁹且於1992年3月正式生效；1994年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初訪俄國時，雙方又簽署了《「中」俄國界西段協定》，這兩個協定是兩國關係史上第一次用法律形式固定了幾乎全部的「中」俄邊界，而關於尚未解決的兩個島的歸屬問題，兩國領導人同意繼續討論，協商解決之道。據俄國外交部官員於1999年4月28日透露，中共與俄國已就彼此東邊天然國界黑龍江沿岸數千座無人島嶼及水道的主權問題達成協議；同年的12月初，俄總統葉爾欽四訪北京，雙方外交部長簽署了兩國政府關於「中」俄界線東、西段的敘述協議書以及關於對界河中個別島嶼及其附近水域進行共同經濟利用的協定。¹⁰至此，解決了長達三百年之久的邊界糾紛，而這也反映出了雙邊不斷深化的關係對解決邊界問題所具有的決定性作用。

1950至60年代「中」蘇軍事同盟的順利建立，「國家利益」的考量是主導因素，而「意識形態」則扮演了「催化劑」的角色。中共學者就認為：中共向蘇聯「一邊倒」的戰略方針是中共領導人從最大限度地維護「新中國」國家利益出發，而獨立自主地制定出來的，絕非別國影響和作用的結果¹¹。諷刺的是，雙方端賴此兩因素而結合，又由

9. 薛君度、陸忠偉主編，《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周邊形勢》（北京：時事出版社，1995年），頁367。

10. 〈「中」俄元首；深化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大公報》，1999年12月10日，版A2。

11. 張小明，〈冷戰時期新中國的四次對外戰略抉擇〉，出自劉山、薛君度主編，《中國外交新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1月），頁7。

於該兩因素而分裂，這證明了「今日的朋友，可能就是明日的敵人」；在後冷戰時期，雙方則排除了意識形態的分歧，著眼於國家利益而締結夥伴關係，這也反映了當前主導國際關係發展的潮流仍以「新現實主義」為主。惟值得注意者是兩時期國家利益的內容有所差異，後冷戰時期國家利益的涵括範圍還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而明顯地比1950年至60年代時要來得廣泛，除了傳統的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領域外，還涉及到環保、能源探勘與開發、生態等全球議題。

昔日的同盟關係具有針對性，而今日的夥伴關係「名義上」無針對性，但實質上則否：1950至60年代的「中」蘇軍事同盟是針對以美國為主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這點毋庸置疑，不再贅述；後冷戰時期的「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雖然「名義上」無針對性，但觀諸歷年來雙邊所發表的聯合聲明或新聞公報之內容，則很明顯地是針對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

昔日的「中」蘇同盟大體上是中共有求於蘇聯，而今日的夥伴關係則是雙方互有所求：1950至60年代正值中共建政初期，國內外環境一片混亂，政權根基不穩，而蘇聯當時已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龍頭且為全球兩大超強之一；置身於西方的圍堵下，因而中共憑藉著同盟關係要求同門師兄蘇聯的援助是理所當然的。但在後冷戰時期情況則有不同，俄羅斯目前正從蘇聯解體、國內政經情勢混亂的陣痛中療傷止痛，而中共則推行「改革開放」、大力推動經濟發展，兩國都需要一個穩定的外在和周邊環境來從事國內的建設，這就為後冷戰時期兩國關係的重新定位鋪了路。另一方面，雙方在國際事務及全球議題上的共同利益也要求兩國必須締結一種迥異於以往單純的軍事同盟形式的合作關係來協調彼此的行動，同時鞏固本國的大國地位及確保大國影響力得以發揮，而「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就是這種思潮下的產物。

(二)防止「新干涉主義」的潮流

科索沃戰爭的爆發，標誌了一個新概念的產生—「新干涉主

義」。依學者之見，「傳統干涉主義」所體現的法律原則是：¹²第一、國家不論大小，享有平等主權；第二、任何國家的內政均不容干涉；第三、非自衛性的使用武力需經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同意，並以一定條件為限。

因而我們可得知，「傳統干涉主義」主要是適用於解決跨國界的爭端，對屬於他國內政的事務則採取「不干預主義」的立場。中共和俄國認為，北約插手科索沃問題正體現出「新干涉主義」，推翻了「國家不論大小主權一律平等」的原則，也就是西方各國為了實現其霸權主義的目的，因而需採取一些新策略並提出一套新理論，而「新干涉主義」就是這種構想下的產物。該原則主張「必須對不干涉內政原則的重要方面加以限制」、「國家主權不及人權重要」、「不是為土地而戰，而是為價值觀而戰」，並強調「軍事干預是一種重要手段，要大力擴充軍隊，強化軍事聯盟」。¹³這種原則是欲把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強灌於他國，若他國不服從，則以武力威嚇甚至武力介入之，因此也是一種「新殖民主義」。

美國戴維斯大學教授葛蘭倫(Micheal T. Glennon)在1999年5、6月號的《外交事務》雙月刊上也以「新干涉主義」為題，為北約空襲南斯拉夫辯護。他認為：南斯拉夫迫害科索沃省阿裔人民乃有目共睹，國際也普遍支持北約介入；然而，在現今聯合國安理會的架構下，根本無法對暴行採取有效措施並予根絕。北約是為了維持國際正義及人道精神，才在未經安理會授權的情形下空襲南國；由於國內衝

12. 劉實，〈論北約插手科索沃問題－新干涉主義能成為國際法規範嗎？〉，《海峽評論》，1999年7月，頁10。

13. 《人民日報》，1999年5月17日，版8。除此之外，中共和俄國認為，「新干涉主義」有兩大理論之點—第一，「人權高於主權論」，提出「主權有限論」、「主權過時論」、「人權無國界」，大力倡導「人權外交」和「新道德運動」；第二，「捍衛人類普遍的價值觀」，認為人道主義、民主和法治的價值觀應該推廣到全球。

突已取代國際衝突成為影響國際安定的主要因素，使聯合國憲章嚴禁他國介入的「不干預主義」原則顯得不合時宜，因此應以人道精神為出發點的「新干涉主義」取而代之，儘管此一新原則缺乏法治架構，但卻能立刻發揚人道精神；而只要權力用於正途，法律可朝防止單一國家濫權方向慢慢進行。畢竟，國際正義的伸張對聯合國而言才是最艱難、最可貴的部份，所以修正國際法加以反映的過程可以慢慢來。¹⁴

總結起來，西方與俄國和中共對科索沃危機的不同看法，從法理上看，就是兩個不同原則的分歧：尊重國家的領土主權完整，還是保障普遍的人權和自決，也就是所謂的「主權」與「人權」的爭論。而仔細分析中共與俄國反對的另一原因，就是此兩方境內均有嚴重的少數民族問題，如俄羅斯的車臣共和國在分離主義份子的鼓動下尋求獨立，1994年12月俄羅斯政府曾派軍隊鎮壓，但效果不彰，1999年9月又爆發了第二次車臣戰爭，然而不論其結果如何，它仍舊是俄國內政上一個潛藏的不定時炸彈，頗令政府當局頭痛不已。而中共的少數民族問題，則又更加嚴重了，光「藏獨」和「疆獨」分離主義運動就已經使中共窮於應付了，另外又有一個非屬少數民族的「台獨」問題亟待解決。更麻煩的是，中國大陸境內的少數民族獨立運動背後均有外國勢力的介入，因而中共更擔心，一旦這些少數民族聚居地發生類似族群衝突及分離運動，外國勢力到時就可以打著「新干涉主義」的「人道主義」旗幟，光明正大地加以干預，屆時情況會變得更為複雜。

目前俄羅斯的第二次「車臣」戰爭開始之初也由於「新干涉主義」的影響而使俄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一度面臨緊張，儘管雙方後來都各退一步，但俄國和中共對彼此少數民族問題的性質已有「共識」，就是將其視為內政而「互不干預」，不過未來的國際局勢詭譎

14. Michael T. Glennon, "The New Interventionism,"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3, May/June 1999, pp.2-7.

多變，因此車臣、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問題很可能也是循著「科索沃模式」發展，即內部動亂→成立非法武裝或政府→將民族問題國際化→國外勢力介入。為了加以反制，中共與俄國在1999年8月底的「比十凱克」會議後發表的聯合公報上重申反對「用人權作為干涉他國內政」的藉口。¹⁵ 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同年的10月18日至11月3日，還訪問西歐、非洲、中東六國，展開所謂的「反新干涉主義」之旅。¹⁶ 俄國總統葉爾欽也由於俄國發動第二次車臣戰爭之初無法得到西方的諒解而於12月第四次訪問中國大陸尋求支持。由此可見中共與俄國堅持「主權」高於「人權」的觀點，除了維護傳統國際法及國際政治的原則外，也有其現實上的考量，故雙邊關係也因此而更加密切。

(三) 倡導以多極體系來取代「美國領導的單極世界」

學者陶意志(Karl Deutsch)和辛格(David Singer)認為多元化比冷戰的兩元體系更穩定。原因在於：(1)多元體系的每一個國家不需要歸屬於兩國集團，而居主宰地位的強國因為需要同時注意幾個國家，所以注意力分散，衝突機會減少；(2)多元體系的互動機會比兩元體系多，對峙的機會相對減少，國際關係趨於緩和；(3)對立機會減少，軍備競賽也會相對減緩，因為權力平衡可發揮功效，減少國家擴充軍備的必要。¹⁷

15. 〈中共與俄、哈、吉、塔舉行五國首腦會議〉，《大陸情勢雙週報》，中國國民黨大陸研究工作會編，1999年9月16日，頁31。

16. 如江澤民在訪問阿爾及利亞時，就表示：「中國主張各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開展人權對話和合作，反對將人權問題政治化，特別是利用人權問題干涉發展中國家內政的做法。目前，國際上有些人提出「人權高於主權」和「國家主權有限」的新干涉主義，這值得廣大愛好和平的發展中國家的高度警惕。事實上，人權要靠主權來保護，不是人權高於主權，而是沒有主權就沒有人權。」

17. Karl Deutsch and J. David Singer, "Multipolar Power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World Politics*, Vol.16, No.3, April 1964, pp. 390-

受到該理論的影響，中共與俄國認為，雖然在冷戰後時期國際格局呈現的是「一超多強」，但正逐漸向多極化世界過渡，中共和俄國在此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阻止美國「稱霸世界」及其「建立單極世界」的理想，並極力促使多極化世界格局早日來臨。據中共的分析，冷戰後美國開始了新時期的戰略擴張，它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並認為自己處於歷史上最安全的時期、經濟最繁榮的時期以及內政問題上處理最妥善的時期，美國是經濟、軍事等硬國力和文化、價值觀等軟國力的有機結合，現在根本不存在什麼多極世界，而是美國具有絕對優勢的世界，因而美國要利用今後 20 年左右的「戰略機遇期」，加緊控制世界和塑造世界。

美國目前的跨世紀全球戰略框架已基本成形，其目標是：建立美國領導的世界新秩序，確保二十一世紀成為「美國世紀」。¹⁸有了這種體認後，「中」俄兩國在彼此交往的過程中，也不斷重申「建立多極化世界」的理想，並試圖爭取其他國家的支持與認同。如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於 1999 年 6 月 8 日會見科索沃問題特使、芬蘭總統馬爾蒂·阿赫蒂薩里時表示：「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悍然對南斯拉夫動武，此事非同小可，絕非孤立事件，而是關係到建立什麼樣的國際新秩序和二十一世紀向何處去的根本問題。冷戰結束後，世界的多極化趨勢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而企圖建立單極世界和確立世界霸權，將對世界和平和穩定構成嚴重威嚇」。¹⁹

1998 年 11 月 23 日俄羅斯總統葉爾欽與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共同發表的《中俄高級會晤結果聯合聲明》中也再次強調，國際關係具有

406. 林碧炤，《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7 年），頁 117。

18. 袁智兵，〈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干涉主義〉，《大公報》，1999 年 11 月 10 日，版 C12。

19. 《解放軍報》，1999 年 6 月 9 日，版 1。

建設性的多極化進程有助於建立一個平衡、穩定、民主、不對抗的新秩序。這一趨勢客觀上符合所有國家的根本利益。顯而易見的是，科索沃戰爭的發生和北約東擴更堅定了「中」俄兩國積極推動多極化世界的決心，希冀以此實現主要大國間的權力平衡，進而以多極制衡力量，牽制美國的「單極」霸權。此外，因為多極化的每一「極」均反映一類國家的利益，故多極合作或大國合作，將可體現一種民主協商的精神，同時「中」俄則可藉此多極化格局，發揮和鞏固其大國的影響力，確立獨立「兩極」之大國地位，²⁰而「中」俄夥伴關係就是重建這種世界新秩序的一種「過渡現象」。

(四)經濟的互補與合作

除了地緣政治及預防衝突的一般議題之外，經貿關係也是「中」俄雙方合作夥伴關係得以建立的重點之一。經濟過程的全球化、自由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正在把所有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納入全球市場體系，各國經濟上的互賴程度提高，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而新自由主義主張經濟利益與國家生存安全同等重要的論點也就深深地影響了各國的對外政策，「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主要考量嚴格說來除了軍事上的相互交流、政治上的相互支持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經濟上的相互合作。

一個改革開放的中共和一個政經轉型的俄國在經濟上有很大的互補性，中共的農產品、民生必需品和俄國的工業(尤指高科技和原料)產品是雙方經貿往來的重點所在，以物易物的風氣極盛，地理環境相鄰也刺激了雙邊貿易的往來。²¹雙邊貿易額在1991年為39億美元，

20. 秦邦九，〈中共推動「多極化」世界格局與「夥伴外交」之研究〉，《共黨問題研究》，第25卷第9期，1999年9月，頁44。

21. Paul Marantz, "Moscow and East Asia New Realities and New Policies", Sheldon W. Simon, *East Asian Securit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New York: M.E. Sharpe, 1993), p.34.

1996年達到68億美元，到1998年則為54.8億美元，有顯著衰退之勢，而雙邊經貿關係的發展始終趕不上政治關係的腳步，且撇開軍備交易不談，貿易額近幾年來持續停留在50至60億美元左右，也同1996年4月兩國定下在公元2000年達到200億美元貿易總額之目標有所差距，可見雙邊的經濟合作已到達了一個瓶頸，未來有待於西方資金技術的投入以提供其成長動力²²。但總的說來，在兩國政府的努力下，這種存在已久的經貿臍帶關係料想將會維持一定的水平。另一方面，雙邊夥伴關係的不斷加溫，也為雙邊的經貿發展提供了一個持久穩定的外在環境，使得兩國得以減少針對彼此的軍事支出而多投注於經貿發展。

三、「中」俄戰略協作夥伴下的雙邊軍事交流

中共認為，在後冷戰時期，在世界大戰打不起來的情況下，最容易引發軍事衝突的往往是區域民族、宗教糾紛與領土爭執。戰爭形態也改變為強調「精密武器、資訊戰」為主的「高科技條件下的局部戰爭」。這種軍事發展潮流的變化在「波斯灣戰爭」及「科索沃戰爭」中表露無遺，亦促使中共決心進行軍事及國防建設的改革，並著重海洋戰略的發展，因此對高科技的軍事武力的需求更形迫切。

繼承蘇聯的俄羅斯雖然經濟萎靡不振，但軍事上仍是僅次於美國的強國，有著強大的軍力。因而中共尋求和俄國的合作，除了緩和陸上軍事壓力，確保周邊環境的和平與穩定，以及藉此在與美交往上打「俄國牌」，抬高自己的身價外，最重要的實質利益是可自俄獲取北京已難以自美歐日等先進國家獲得先進科技，尤其是軍事科技。²³此

22. Gilbert Rozman, "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1990s: A Balance Sheet," *Post-Soviet Affairs*, Vol.14, No.2, April/June 1998, pp.93-113.

23. 唐仁俊，〈後冷戰時期中共對俄羅斯外交政策之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42卷，第12期，1999年12月，頁79。

外，由於冷戰的終結，國際上限武裁軍的氣息高漲，俄國國內本身也不需要那麼龐大的武器系統，加上軍轉民政政策的實施、俄國長期的經濟衰退，以及國防經費的削減等諸多變數的影響，使得國防工業雪上加霜，故俄國國防工業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拓展外銷。觀諸整個國際局勢的演變，最大也最有意願和能力的買主將是政治、經濟和軍事上逐漸壯大的中國大陸。在一方必須以武器出口來維持本身國防工業的研發及賺取外匯，以及另一方高倡「科技強軍」，實行國防現代化和軍事改革，以成為區域及世界強權等因素的催化下，加上雙方長期以來武器系統方面的一致性，在雙方需求具互補性的條件下，兩國沒有不合作的道理，特別是雙方的軍備交易，始終是國際關注的焦點所在，且發展態勢也超過其他領域，故俄國一位官員曾表示：「兩國軍事科技的交流已遠遠超過貿易利益或國防利益的範圍」。²⁴中共近年來所採取的「軍事外交」²⁵無疑地在「中」俄戰略協作夥伴中得到了最好的落實。大體而論，雙方軍事交流的形態約可劃分為以下四種：

(一) 國防科技合作

中共自建政以來，在國防科技研發方面，雖然強調獨立自主的路線，但其武器裝備的發展仍克服不了瓶頸，因而對外國技術，尤其是蘇聯技術始終存有高度的依賴性。但以槍桿子起家的中共，深知軍事武力是維持國家地位和政權穩定的最佳保證，故鄧小平一再強調的

24. 吳春光，〈俄羅斯與中共的戰略夥伴關係及其對我國的影響〉，《政策月刊》，第42期，1999年1月1日，頁30。

25. 中共「軍事外交」的作用有五點：1. 維護周邊環境的和平和安定；2. 促進軍事政治情勢、軍事經濟形勢，以及軍事戰略形勢等朝有利於中共的方向發展，改善中共的國際環境；3. 加強與外國的軍事交流、同友好國家建立相對穩定的關係，發展與擴大對中共有力的軍事關係；4. 加強對國際軍事形勢與武裝力量的了解，有利於正確判斷軍事形勢，為制定國防政策和對外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據；5. 宣導和闡明中共在重大軍事問題上的立場、觀點和主張，維護國家尊嚴和利益，提高本身在國際上的地位。

「要走自己的路」，反映在國防建設上，就是一切根據中國國情加以取捨，要認識和掌握新時期國防建設的規律，把馬克斯主義和具體實際相結合，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防現代化發展道路。

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和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給予中共刻骨銘心的印象，也使中共感受到高技術的優勢與威力。在後冷戰時期，軍事力量的強弱，不僅是人員素質和武器質量的高低差異，而且將是人員、武器、科技、機制等的綜合軍事力量的對比。因此中共一方面提倡所謂「科教興國」戰略，就是要以「教育為本，把科技和教育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位置，提高全民的科技、文化素質，把經濟建設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換言之，中共認為要「興國」必須發展科技，發展科技就要「興教育」，「興教育」要培養人才。把科技、教育、人才三者連在一起，就是「科教興國」戰略。²⁶而把此戰略運用在國防建設上的話，就叫做「科技強軍」戰略。

中共的對外開放政策，必須吸收外國的資金和技術來幫助發展。從歷史、經濟負擔能力及地緣政治角度觀之，俄羅斯可說是中共的最佳選擇，它有最龐大的軍工生產體系，並已培養近萬名的軍事科技專家和武器製造業的專門人才，況且中共一向採用俄製武器，因而選擇俄國顯然比其他國家有利，是實現國防現代化的捷徑。在雙方領導人多次互訪後，雙方軍事關係有擴大的趨勢，而根據《加強雙邊關係的基本原則議定書》的基本精神，雙方軍事產業將在「軍轉民用」技術交流，以及尖端軍事科技轉移方面進一步加強雙向交流和合作關係。²⁷有關雙方的軍事合作計劃，目前已有三個秘密協議、二十九項條文，

26. 黎健，〈中共「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與影響〉，《中國大陸》，1995年8月，頁324。

27. 黃鴻博，〈後冷戰時期中共與俄羅斯互動關係之研究〉，《共黨問題研究》，1995年9月，頁11-12。

而俄國軍事專家將為中共軍官訓練高科技武器的使用與人才的培訓；另外，中共也利用俄國經濟的困窘，以優厚的待遇，延攬大批俄國軍事科技人才以為己用；「中」俄官方也成立了「軍事科技合作委員會」，負責軍事科技交流的事宜。1999年11月中共的無人太空船「神舟號」的試飛成功，就是「中」俄科技交流的具體成果之一(俄國培訓中共的太空人，而中共也仿效俄國製造太空船的技術)。

(二)軍備的交易

軍備交易似乎是今日的「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中最熱絡的一環。中共國防經費在後冷戰時期呈現「傾斜分配」的趨勢，即在「優先發展海空軍、重點發展戰略導彈部隊和陸軍特種部隊、適度發展航天軍」的思想主導，加上「波斯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的影響之下，²⁸先後從俄羅斯進口七十二架Su-27戰機並計劃自行生產兩百架同型戰機、三十架Su-30型戰機、兩艘配備SS-N-22日炙(Sunburn)超音速反艦飛彈的現代級(Sovremenny)驅逐艦、四艘基洛級(Kilo)潛艦、四套S-300PMU-1型反飛彈系統加一百枚飛彈、IL-76空中加油機、AA-9和AA-10空對空飛彈、120厘米口徑自走炮、Mi-17武裝直升機，以及T-72、T-80、T-90等先進戰車等。²⁹

今年一月俄國同意把先進衛星定位系統(Glonass)移轉給中共，提升其導彈命中率。中共並計劃再採購兩艘現代級驅逐艦、二十枚SA-15地對空飛彈、四十架Su-30MKK戰機、更先進的S-300PMU-2反飛彈系統、兩艘更先進的Akula級核子動力潛艦，同時與俄國合作開發短

28.如《戰略與管理》雙月刊6月刊載中共國安部「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學者張文木撰寫的〈科索沃戰爭與中國新世紀安全戰略〉一文中指出，「必須迅速地將以本土自衛為主的國防模式，調整為以制海和制空權為主的國防模式」。

29. Gennady Chufrin, *Russia and Asia: The Emerging Security Agend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311-312。

場起飛和垂直起降飛機、新型空對空飛彈及反彈道飛彈防禦系統等。此外，中共更有意購買最先進的 Su-35、MiG-31 及 Su-37 金雕等戰機，惟仍在談判當中。總之，俄羅斯的軍火業愈來愈依靠對中共的軍售，而中共則利用優勢巧取豪奪其先進武器和科技，依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的資料指出，從 1991 年至 1997 年，中共自俄購買了總值六十億美元的先進武器，俄羅斯近年來每年出口武器約值十億美元，佔其出口總值的 20%，而中國大陸市場佔俄羅斯軍火輸出的 40%。

³⁰ 由此可見中國大陸對俄國軍火工業的重要性。

對中共而言，與俄羅斯的軍事交流在 1990 年代後已取代了 1980 年代間與美國軍事交流的功能，展望未來，中共與俄國的軍事交流可望隨著對俄武器採購的增加而更加強化，而同美國的交流卻相對受到限制。在中共採購的俄製武器系統當中，除了 Su-27 和 Su-30 為生產線合併轉移外，其餘武器系統大都是少量購買，未來在後勤補給和零件維修方面對俄羅斯的依賴極深，而後冷戰時期以來，「中」俄關係的發展就是以軍售和支持這些軍售的功能性交流為主要內涵，未來由於中共對俄製武器的依賴程度漸增，雙方的軍事交往還會更勝於前。³¹

(三) 軍事人員交流

1994 年 4 月 25 日，在俄國國會舉行的一場對中國大陸關係的聽證會中，俄國副參謀總長柯契馬索夫(Kochemasov)表示：「俄羅斯與中共間的軍事合作自 1990 年起恢復，並且迅速發展。這種合作自然可以形容為建設性的商業關係。交易的規模非常龐大，並包括雙方最高層

³⁰ 石碌，〈「中」俄聯手對抗美國的新格局〉，《中央日報》，2000 年 1 月 24 日，版 11。

³¹ 如 1999 年 10 月中旬，中共解放軍總參謀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和國防科委在制定新一年度軍事發展工作計劃會議上指出，「中」俄軍事合作將邁向新全面提升時期，從 2000 年至 2004 年的五年間，「中」俄在軍事合作上的花費，將達到 200 億美元。

人員的互訪」。³²

中國大陸方面，在1991年4、5月間，中共「國防部外事局長」宋文中和前蘇聯國防部外事局長胡若柯夫(Hyrokov)首度互訪，雙方就擴大軍艦、軍醫、軍事學家、軍事運動員、軍校代表團以及軍事記者互訪事宜進行會談。同年5月，中共「國家軍委副主席」劉華清率領軍事代表團訪蘇，與蘇軍參謀長莫謝耶夫(Mosheev)及國防部長雅佐夫就改善並擴大雙邊軍事關係進行會談，雙方並於1991年6月中旬簽訂了《「中」蘇軍事工業科學技術合作協定》。自1993年4月以來，「中」俄軍事官員互訪與交流變得非常頻繁。如同年6月，劉華清率領代表團赴俄訪問，同俄國副總理就「中」俄工業、科技合作、軍轉民等問題交換意見；1994年4月中共總參謀長助理隗福臨率邊防代表訪俄，討論邊防裁軍與安全問題；6月中共空軍司令員曾雙明率團訪問莫斯科；7月中共「國防部長」遲浩田率軍事代表團訪問俄羅斯，並同俄國簽訂《預防危險軍事活動協定》。

1996年後共軍官員訪俄重要者有：1996年4月共軍參謀長傅全有訪俄；8月中共北海艦隊副司令員張定發率艦訪俄；10月中共北京軍區司令員李來柱訪俄；11月中共空軍司令員于振武訪俄；1998年8月共軍友好參訪團訪俄，同俄羅斯軍方領導人就兩軍交流問題進行會晤；最後就是今年的1月中旬，中共「國防部長」遲浩田再度訪俄，同俄國防部長謝爾蓋耶夫(Sergeev)舉行正式會談，雙方並簽署了《「中」俄兩國國防部關於進一步加強軍事領域合作的相互諒解備忘錄》。

俄羅斯方面，1993年5月俄國列寧格勒軍區代表團訪問北京；同年下旬俄國海軍太平洋艦隊的大型反潛艦「潘捷列耶夫」號、驅逐艦「快速」號和油輪「葉果爾雷克」號抵達青島進行五天的友好訪問；1993年11月，俄國防部長格拉契夫(Grachev)赴北京訪問，雙方簽訂了《五年軍事合作協議》；1994年4月俄國參謀長科列尼斯科夫

32. 〈俄國舉行中國問題聽證會〉，《中央日報》，1994年4月28日，版2。

(Kleniskov)訪問中國大陸；6月俄羅斯及哈薩克等四國外交和軍事專家聯合代表團前往北京，舉行第十二輪邊防裁軍和加強軍事領域信任問題的談判；1996年4月俄羅斯代表團訪問北京；7月俄國邊防軍司令尼古拉耶夫(Nikolaev)訪問中國大陸；1998年俄軍事總監科科申(Kokoshin)應中共「國防部長」遲浩田之邀訪問北京；7月第一副參謀長馬尼洛夫(Manilov)應共軍總參謀部邀請訪問北京，同中共副總參謀長熊光楷共同舉行「中」俄兩軍總參謀部第二輪戰略和安全磋商，並和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及參謀總長傅全有會晤；10月俄國防部長謝爾蓋耶夫(Sergeev)應中共「國防部長」遲浩田之邀訪問中國大陸，與中共軍方領導人會晤。隨著「中」俄雙方關係的日趨加溫，雙邊軍事官員交流也會愈頻繁，軍事合作方式與領域也會更為廣泛。

(四)軍事互信措施和聯合演習

在後冷戰時期，由於國際局勢的和緩和發展趨勢的改變，國家安全的界定遂面臨重新調整，而有與傳統安全觀相異的「新安全觀」之產生。中共的「新安全觀」不僅在範圍上涵蓋甚廣，並且重視議題連結對國家整體安全的影響力，因此有「綜合安全觀」的出現。在作法上為順應「新安全觀」所要求的「要對話合作、不要對抗衝突」的思維，而引伸出一套「安全合作」的模式，來營造國際間「和平與發展」的氣氛與其本身追求和平發展的溫和印象。反應在對外政策上，就是透過所謂的「夥伴關係」來實行，這種「新安全觀」與「安全合作」的構想，首先在「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中得到落實。³³

1996年4月中共同俄羅斯、哈薩克、塔吉克、吉爾吉斯共五國簽訂了《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協定》。³⁴1997年4月相同

33. 邱昭憲，《冷戰後中共的安全觀與東亞安全合作》(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頁68-69。

34. 協定的重點包括：部署在邊境地區的軍事力量互不進攻；不進行針對某一方的軍事演習；限制軍事演習的規模、範圍和次數；通報邊境一百公里縱深地

五國再度訂定《關於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這兩項協定強化了「中」俄雙方在軍事領域上的信任，中共更推崇此乃值得倡導的新安全模式。

1999年8月五國代表第四次聚會於比什凱克，發表了聯合聲明，對以往五國為鞏固地區安全與合作所採取的順應時代潮流的實際步驟表示高度評價，同時重申所簽署並獲批准的《解決邊界問題協定》、《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協定》及《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協定》有利於「加強睦鄰友好」，為保障地區安全和穩定做出了「建設性貢獻」，強調「建立具體的相互協作機制，有利於充分發揮多邊合作潛力，促進地區穩定、安全、發展和繁榮」。

在軍事演習方面，1999年10月初，俄國太平洋艦隊的兩艘軍艦曾經訪問上海，並首次參加了中共海軍的聯合演習，這顯示出雙方軍事合作上日趨密切。

參、「中」俄軍事交流對新世紀亞太安全格局的衝擊

目前亞太地區情勢尚稱穩定，但這畢竟是透過和平的方式從冷戰時期演化過來的，而冷戰時期殘存的許多矛盾並未消除，且隨著情況的發展也衍生出一些新的矛盾，故本地區仍然存在著不穩定的因素，主要表現在：亞太地區的主導權問題、領土及主權爭議，以及各國擴充軍備的趨勢進一步加強等。

一、美國對「中」俄的遏制

冷戰的終結，在世界上明顯的是軍事衝突和錯誤認知之減緩或減少，然而在亞太地區，卻因美國亞太駐軍的遞減、與中共軍事現代化的軍事威脅，與世界軍備供過於求和亞太地區在後冷戰時期經濟快速

區的重大軍事活動情況；相互邀請觀察實兵演習；預防危險軍事行動；加強雙方邊境地區軍事力量和邊防部隊之間的友好交往。

成長之下，進而呈現大幅發展軍備，呈現出軍事競賽之勢，尤其是「中」俄與美日間的軍事對峙日益白熱化。

美國自蘇聯解體後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一方面倡導「單極世界」理論，同時推行「危機處理戰略」，其首要及優先目標當然是維護和確保美國的國家利益，³⁵以建立「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1998年12月柯林頓政府推出的「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就是這種理念的具體呈現。該戰略的總目標是「領導整個世界」，具體目標是加強美國的安全、促進美國的經濟繁榮、推動海外民主。實施這項戰略的手段是：加強軍事實力，致力於美國外交，促進世界經濟發展和國際金融穩定，加速經濟、技術、文化和政治的「全球一體化」，加強民主自由的力量，並特別強調要「保持精銳的軍隊」，做好各種軍事行動和小規模應急行動，「最好與盟友協調一致打贏」兩場大規模戰爭等方面的準備。³⁶

為了實現維護國家利益的目標，美國提出要「加強國內外的安全」對策，提出「要對各種各樣的潛在威脅和危機做出反應」，必須要加強外交和軍事力量，特別是「要保持美國的領導地位」。根據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其著作「大棋盤」一書中的觀點：「就美國而言，地緣政治的大獎是歐亞大陸。五百多年來，世界事務由歐亞大國主導，各國人民相互爭戰以奪取區域霸權，更進而追逐全球強權之地位。現在，一個非歐亞大陸的國家卻在歐亞大陸獨占鰲首，而且美國的全球盟主地位直接依賴它在歐亞大陸的優勢能維持多

35.美國主要的國家利益在於保障美國的主權、領土和人民，防止任何威脅美國本土的行為，包括核生化武器的攻擊和恐怖主義；防止敵對區域聯盟或霸權的出現；確保國際海線之通訊、飛航及天空的安全；若有需要，協助美國盟國與友邦對付外來侵略。請見張亞中、孫國祥，《美國的中國政策》，(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頁172-173。

36.黃碩風，〈科索沃戰爭與美國稱霸全球戰略〉，《中國評論》，1999年10月號，頁17。

久，或多麼有效」。³⁷美國認為「控制了歐亞大陸就能維持其主導地位」，故冷戰結束後，就策劃從歐亞大陸東西兩端控制邊緣地帶，並採擠壓式策略逐步推進，而其軍事戰略也順應時勢而變更為「塑造、反應、準備」的原則。

美國一方面不顧俄羅斯的反對，在歐洲主導北約東擴，同時藉「科索沃」戰爭來測試北約「新戰略」³⁸及擠壓俄國在東歐的戰略空間，並透過《東南歐穩定公約》來穩定該地區的緊張局勢。在亞太地區，繼續強化各主要的聯盟，如美泰軍事同盟、美韓軍事同盟，1998年與菲律賓簽訂《來訪部隊協議》，同時新加坡也已允諾提供該國的樟宜海軍基地給美國軍艦作為維修補給之地，而在這些軍事聯盟或交流活動中，美國最為重視的是同日本的軍事同盟，雙方也於1996年4月簽署《美日安保聯合宣言》，並視兩者的聯盟關係為維持亞太安全的基石。美國也積極扶植區域大國如日本、澳洲來輔佐本身維護亞太地區的安全與穩定。³⁹

此外，美國推動「國家飛彈防禦系統」(NMD)和「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的研發，並增加了軍費的開支，從而保持美國軍事實力上的優勢，同時形成了對「中」俄的東西包圍網。

37. Zbigniew Brzezinski 著，林添貴譯，《大棋盤》(台北：立緒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98年)，頁36。

38. 「北約新戰略」是在1999年的4月24日北約成立五十週年時，於華盛頓首腦會議上所揭曉的。詳細內容請見張祖謙，〈世紀末戰爭啟示錄—北約新戰略及其分析〉，《中國評論》，1999年6月號，頁5-6。

39. 美國在東北亞透過《美日安保宣言》及美日軍事同盟要求日本分擔更多維持區域和諧責任的同時，也在東南亞鼓勵澳洲主動出擊維護區域和平，故有所謂的「霍華德主義」的產生—是指澳洲要加強國防力量，發揮新的作用，以成為美國在亞洲維持和平的副手。

二、「中」俄外交政策及軍事戰略的轉變

作為美國明指的潛在對手「中」俄兩國，為了反制美國，也採取了一連串的相應措施；在俄羅斯方面，獨立之初，俄國與美國的關係出現了根本性的轉機，昔日意識型態的枷鎖似乎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戰略合作。這種氣氛反映在外交政策上，就是奉行向西方「一面倒」的外交政策，在軍事戰略上則奉行「純防禦」戰略，並著手進行大規模的裁軍和改革，同時希望透過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讓步，來獲取大量的西方資金，以力求早日恢復經濟的活力，當時的總理蓋達(Gaigar)就曾表示：「目前對俄羅斯來說，奉行親西方政策是唯一明智的選擇」。⁴⁰

西方各國對俄國的示好舉動確是反應冷淡，不僅承諾對俄國的援助常口惠而實不至，且在政治、外交和安全方面把俄國摒棄於一連串重大國際問題的決策和緩和之外，北約組織甚至不顧俄國的反對而執意東擴，更對俄國的安全構成的直接威嚇。

為了因應此種情勢，1994年後，俄推行「雙頭鷹」外交，1996年6月並提出了「現實遏制」軍事戰略，認為冷戰結束後俄國國家安全面臨內外雙重威脅。⁴¹而俄國的責任，就是重振大國地位，確保國家利益，而在國防建設上，也維持120萬員額，並著重高科技和尖端武器的研發。1999年的北約東擴、科索沃戰爭、第二次車臣戰爭以及美國企圖研發TMD和NMD，並威脅退出「反彈道飛彈條約」等事件的衝擊，造成了10月8日「俄羅斯聯邦軍事學說」的出爐。

該學說最令人注目的是鮮明地提出「當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單極世界和多極世界兩種傾向的相互抗衡，並主張要致力於建立反對單極

40.馮紹雷，《制度變遷與對外關係—1992年以來的俄羅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505。

41.俄國外部威脅主要有來自三方面：西方有北約東擴、南方有回教分離主義勢力、東方則有日本和中國大陸的崛起。

獨霸的多極世界，使俄羅斯成為未來世界的重要一極」；不僅將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當作主要的軍事對手，而且視為現實的威嚇，突出了今後在軍事上與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抗的決心；在軍隊建設上，持續強調核武器是遏制侵略、保障俄國及盟友軍事安全、維護國家穩定與和平的有效力量。在今年1月公布的《國家安全構想中》也指出：當所有其他解決危機的方法均以用盡或證明缺乏效果之後，有可能使用所有可以運用的武力和方法，包括核子武器，並更加重視常規力量的實戰作用，同時大幅增加國防預算，以改善軍費拮据的窘境。⁴²1999年科索沃戰爭結束後舉行「西方—99」的軍事演習，標誌了俄國對西方的重新認識和定位。

從俄國外交政策及軍事戰略的轉變，可以看出其欲和西方一較長短的雄心，但俄國國力畢竟不若從前，故需要結交有力的盟友，而近年來始終在國際事務上同俄國步調一致的中共就成了最佳選擇。俄國總統葉爾欽在1999年12月四訪北京尋求中共的支持，也如願以償，加上雙邊長久以來的邊界問題已得到解決，故夥伴關係因而更加鞏固，且達成一筆十億美元的軍售交易。

在中共方面，因應國際局勢的和緩及世界發展的趨勢，1985年實行了「戰略轉變」，由臨戰狀態下的應急性發展轉向和平時期的國家建設，軍事上為消除軍隊腫、散、驕、奢、惰，決定面向現代化的精簡整編，這是中共軍事戰略的第一次轉變。1991年波灣戰爭後，以資訊科技為基礎的戰爭型態成為未來的趨勢，中共遂倡導「科技強軍」、「質量建軍」的口號，強調要打贏「高技術下的局部戰爭」；1997年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軍事發展的雙軌策略，軍事上強調「兩個根本性戰略轉變」，⁴³政治上強調「兩個武裝」。⁴⁴總之，就是

42.周柏林，〈俄羅斯的反擊—俄調整國家安全戰略的袖裏乾坤〉，《瞭望新聞周刊》，2000年1月24日，第4期，頁56。

43.所謂的「兩個根本性戰略轉變」，指的是：在軍事鬥爭的準備上，由應付一

在以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的積極防禦為首，強調三個體現：在軍事鬥爭的準備上，由應付一般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轉到應付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在戰略的立足點上，由應付一般情況轉到應付可能出現的各種複雜局面；在作戰樣式上，由過去應付陸地作戰轉變為應付敵人的海空襲擊。⁴⁵

經歷了科索沃戰爭的衝擊後，中共更加著重高科技武器的研發和海空軍的發展，同時增加國防預算，據中共軍方一份國防預算研究報告評估，今年中共的國防費用將達 1,250 億人民幣左右，比 1999 年增長 15%至 19%。而今年至 2005 年期間的國防經費，每年也將以兩位數成長，總數約為 9,950 億元人民幣，約是 1996 至 2000 年期間的兩倍。

46

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以來，東亞國家普遍削減其國防預算，或擱置原先的軍購計劃，使得許多美國和歐洲的軍火商直接受到衝擊。中共由於遭受的波及較輕微，故有餘力大肆擴軍，持續向俄國採購戰機、增添地對地飛彈，並加強海軍軍備。種種舉動均令東亞國家人心惶惶，紛紛重新調整國防政策，增加國防預算。

以南沙群島問題為例，由於該地是多條國際航運線的必經之地，加上資源豐富，因此是兵家必爭之地。中共與東南亞各國近年來為了該群島的主權歸屬問題屢生齟齬，但情況並未擴大；1992 年 7 月第 25 屆東盟外長會議上中共曾提出「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的提議，但迴響不大。1999 年 11 月底，菲律賓曾提出一項《南海行為準則》的草

般條件下局部戰爭向打贏現代技術下局部戰爭轉變；在軍隊建設上，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轉變。

44. 所謂的「兩個武裝」，指的是：要用正確的思想理論、用現代科技特別是高科技知識武裝官兵的要求，一個是建軍之本，一個是強軍之舉。

45. 張明睿，《中共國防戰略發展》（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 年），頁 452-455。

46. 〈中共國防費用增近兩成〉，《聯合報》，2000 年 1 月 29 日，版 1。

案，要求中共簽署，但遭到拒絕。然而在另一方面，中共也不斷在南海諸島建立軍事設施，⁴⁷並繼續佔領更多的島嶼。另外由俄國採購的Su-27戰機、基洛級潛艦及現代級驅逐艦將更能使中共在維護南海主權問題上採取主動。⁴⁸儘管中共一再強調其軍事戰略是「防禦型」的(積極防禦)，且無角逐區域霸主的野心，不過從南海問題上吾人可知，中共的外交軍事雙管齊下的策略，無非是要讓周邊鄰國尤其是美日感到壓力，卻沒有介入的藉口。

俄國與中共沒有領土爭議，且在南海問題上無戰略利益，加上雙方在歷次發表的聯合公報中均強調尊重彼此主權及領土的完整，故預料俄國在南海問題上將支持中共的立場。若東盟接納中共所建議的解決方案，則其經濟力和軍事力將可順理成章地延伸至南海，有朝一日南海恐將成為中共的內海，屆時將會對各國構成極大的生存壓力，而中共的窮兵黷武，也將成為亞太地區的軍事超強，破壞本地區的均勢，引發軍備競賽，同時「中國威脅論」的論調勢必再起，這將不可避免地與美國的政策相牴觸，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駐軍作用也就更為彰顯，故一場「中」俄與美日東盟間的軍事對峙也可能會順勢展開。

另一方面，「中」俄持續增溫的夥伴關係和密切的軍事交流，也使雙方在亞太地區另外兩個衝突引爆點朝鮮半島和台灣問題上掌握了更多有利的籌碼。針對美國要使朝鮮半島成為「非核化區」的政策，一旦北韓屈從於美國的主張，則中共將成為美國所謂的東亞碩果僅存的「流氓國家」，而美國在東北亞的戰略前沿將推進到中共邊境，屆時其勢必更加強化對中共的「和平演變」措施，因此中共當然不會撤

47.如在永興島興建一座軍用機場，在美濟礁構築防禦工事，在永暑礁則建有碼頭和直昇機平台。

48.由於Su-27戰機的作戰半徑大，而現代級驅逐艦配有連美國神盾系統都無法防範的先進反艦飛彈，加上中共即將擁有的航空母艦，故一旦與東盟國家在南海問題上發生軍事衝突，東盟國家的海空軍料想將毫無招架之力。

離對北韓的支持，且現在「中」俄關係良好，俄國與北韓的關係也有改善，「中」、俄和北韓正好可以利用對美國不滿的心理，團結一致在諸多問題上與其討價還價。⁴⁹

三、「中」俄軍事交流對台海安全的衝擊

1979年後，中共的對台政策漸採取文攻武嚇兩手策略。在文攻方面，先後有1979年的《告台灣同胞書》、1981年的《葉九條》及1983年的《鄧六條》等。至1980年代中期之後，鄧小平在《鄧六條》中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就成為中共對台政策的基本原則。日後的兩次《台灣問題白皮書》和1995年的《江八點》大體上均未脫離此種立場。在武嚇方面，中共也不放棄武力犯台，聲稱「不放棄使用武力是為了要促進和平統一」，我方的認知卻正好相反，認為中共「不放棄使用武力」正是阻礙兩岸和平統一的前提。於是在缺乏互信且充滿敵意的情況下，一場兩岸間的軍備競賽就此展開了，

台海問題另牽涉到雙方同美、俄的軍備交易。長久以來，美國在台海安全上的政策無非是要確保兩岸軍力上的大致平衡，因此儘管在1979年同中共建交，並順應其要求，與台灣「斷交、廢約、撤軍」，但也顧慮到此舉會使得台灣居於軍事上的劣勢，故另通過了一個《台灣關係法》，以成為美國得以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和提供其他防務保障的法律依據。⁵⁰雖然日後有「八一七」公報的箝制，但大體上美國仍然遵循既定路線行事，而對台軍售問題也就一直成為「中」美雙方爭論的焦點所在。

49. 蕭朝琴，〈中共「軍事事務革命」對亞太安全之威脅〉，《共黨問題研究》，第25卷第7期，1999年7月，頁71-72。

50. 《台灣關係法》認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貨禁運來決定台灣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對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的威嚇，且為美國所嚴重關注之事；規定美國將向台灣提供使其能夠足夠自衛能力所需數量的防禦物資和防禦服務。

中共自 1979 年後實行「改革開放」，發展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同時從事軍事改革，一度大幅削減軍力，改善與鄰國的環境，以創造一種「和平與發展」的國際氣氛，並為其「四化」製造條件，同時兩岸局勢也因台灣方面開放人民赴大陸探親之舉而有緩和的跡象。惟自 1989 年之後，由於「六四事件」、東歐脫離共黨統治、蘇聯解體導致冷戰終結，以及波斯灣戰爭的影響，中共重整軍備呼聲再起。從 1990 年代開始調整國防戰略，大肆增加國防預算，更新軍事裝備，儼然成為亞太地區的軍事強權，而中共這種反時代潮流的舉動，確實為台海兩岸及亞太地區帶來巨大的衝擊，引起周邊各國的恐懼，國際間遂有「中國威脅論」的提出。⁵¹

美國是冷戰後唯一擁有優勢地位的超強，因蘇聯解體亞太地區威脅消除，加上財政日益惡化，故有裁減亞太駐軍之舉，但中共卻藉此機會致力加速軍事現代化步伐，對周邊國家構成威嚇作用，且中共雖強調以和平方式解決台海緊張與南海領土糾紛，但卻從未公開承諾放棄對這些地區使用武力，導致美國調整戰略，維持亞太駐軍，以免本地出現權力真空，危及地區和平與美國利益。

此外，冷戰終結後，「中國牌」的政治作用消失，基於國家利益和地緣政治，美、日及東盟國家並不希望中共強大，故期待利用台灣牌來制衡中國大陸。但由於中共國力發展迅速，影響力日漸擴大，上述國家在與中共周旋時，打「台灣牌」的餘地十分受限。且它們在同中共建交時，中共都會迫使對方承認台灣問題屬於中國內政，事實上就是為最終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如果有必要)而避免外國干涉留下伏筆。⁵²因此，美日等國在不便直接介入的情況下，遂採取強化雙邊或多

51. 美國就認為中共這種窮兵黷武之舉，是對亞太地區安全發展的壞兆頭，是基於：中共軍費支出穩定增加、中共經濟持續成長、中共不斷向俄羅斯和其他國家購買先進武器和引進先進技術、中共對南海問題的主張和行動。

52. 平可夫，《僵局》(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頁 51-52。

邊軍事合作，同時透過管道對台提供防禦性武器，以增加台灣抗衡的實力。

台灣在解嚴及中止動員戡亂時期後，早已放棄了反攻大陸的夢想，而將國防戰略從「守勢防衛」、「防衛固守、有效嚇阻」調整為「有效嚇阻、積極防禦」—即採取「攻勢防衛」，並積極從事新式兵力建設，力求在軍隊的素質及武器的先進程度方面超前中共，以彌補本身與中共軍隊數量差距龐大的缺陷。而要想在質量方面領先中共，最有效且迅速的方法之一就是進口外國軍備，因此，長期以來與台灣關係密切的美國自然就成為最佳人選。美國基於《台灣關係法》的原則對台灣也有提供防禦性武器以抵禦中共的責任，加上當時中共已自俄羅斯購得 Su-27 戰機，在軍力平衡的考量下，遂有 1992 年布希政府出售 150 架改良型 F-16AB 型戰鬥機給台灣之舉。

為了反制美國的「台灣牌」，同時也給台灣製造談判壓力，中共在後冷戰時期的軍事領域中對美國大打「俄羅斯牌」，強化了與俄國的政、經、軍關係，不斷向俄國購買先進軍備。最值得注意的是 1994 年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初次訪俄，雙方簽署了《長程核子武器停止互瞄》的協議。配合中共稍後不斷進行的核試爆及向伊朗、巴基斯坦等國出售核技術的種種舉動，都是向美國展示其核武實力，這也促使了美國加緊同中共就核裁軍問題加以溝通。

1995 年 6 月李登輝總統的訪美，不但促使中共片面停止兩岸逐步搭建起來的協商管道，更於同年的 7 月及 1996 年的 3 月在台灣海峽試射飛彈，導致「第三次台海危機」，將台灣海峽鄰近區域直接帶入戰爭的邊緣。美國除了一方面派遣兩艘航空母艦至台海巡航，以嚇阻中共可能的侵略舉動，另一方面也於 4 月同日本簽署《美日安保條約》。1997 年 9 月修改《美日防務合作指針》，並巧妙地將台海納入其「周邊有事」的範圍。

同年年底美國向台灣出售愛國者飛彈系統，以抵禦中共短程彈道飛彈的威脅。中共則視此為外國勢力干涉的公然體現，一方面同俄國

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並調整建軍策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調整大陸軍主義「積極防禦」的戰略觀，代之而起的是強調建立空中長程打擊威懾力量與追求海洋強權的軍事發展策略。⁵³另擴大軍事實力，將中國大陸建設成為亞洲軍事強國，統一台灣、進軍南海成為中共第四代領導人樹立個人在歷史上「豐功偉業」的目標。

中共積極從外國，特別是由俄國優先進口先進海空武器，並引進技術轉讓，如在遼東灣葫蘆島建造基洛級潛艦基地，由瀋陽飛機工業集團生產 Su-27 改良型戰機。俄國也由於和西方的交往屢遭挫折，加上面臨北約東擴的威脅，故加大了以軍事行動反對西方的力度。在軍備市場上俄國又遭逢美國和歐洲軍火商的夾擊而施展不開，因此就將國力強盛的中國大陸視為拯救其本國軍火工業的救星，雙方因此一拍即合，各取所需，且一旦中共與俄國發現，有共同合作以抑制美國權力與影響力的必要時，這種單純的軍火交易就進一步演變成戰略聯盟，故雙方的戰略利益可說是殊途同歸。

至今為止，中共已從俄國引進約 70 億美金的先進武器，而同中共的軍備交易的比重佔俄國軍備出口總值高達四成，這些武器中最有可能直接用來對付台灣的先進裝備計有四項：Su-27 型及 Su-30 型戰機、現代級驅逐艦、基洛級潛艦，以及俄國與以色列合作製造的空中預警機。美國傳統基金會的研究則認為，未來可能影響台海均勢的中共新式武器，包括雷達衛星、改良後的 M9 戰術飛彈、超音速反艦飛彈，以及 AWACA 空中預警機，其中大多與俄製武器和俄國科技有關。⁵⁴

雖然 1997 年中共與美國締結了「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但雙方關係仍起伏不定，而美國也仍然重申其對台的安全承諾。同年的 11

53. 〈1999-2000 年中共軍事情勢〉，《大陸問題雙週報》，中國國民黨大陸研究工作會編，第 1331 期，2000 年 2 月 16 日，頁 13。

54. 黃芝溪，〈論中共不承諾放棄武力犯台之研析〉，《共黨問題研究》，第 25 卷，第 9 期，1999 年 9 月，頁 71。

月，美國國防部宣佈了另兩項對台軍售計劃，⁵⁵美國國防部長柯恩(Wil-
liam S. Cohen)也重申美國將依照《台灣關係法》繼續對台軍售。

鑒於中共及北韓等國的彈道飛彈技術的發展日益危及到區域的和諧和穩定，在《美日安防衛新指針》塵埃落定後，美國隨即推進以東北亞安全為主題的美日韓三國安全磋商，協調安全政策，並開始研究建立「國家飛彈防禦系統」(NMD)和「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前者是保衛美國本土免於飛彈威脅，後者則是提供駐外美軍和美國盟邦抵禦飛彈侵襲的保障。⁵⁶此構想一提出，身受北韓飛彈威脅的日本及飽受中共戰術飛彈侵擾的台灣紛表達加入的意願，中共和俄國則堅決反對。

「中」俄兩國一方面針對美國參議院在 10 月 13 日拒絕批准《全面禁止核試條約》之舉，在聯合國大會動員各國通過《維護和遵守反彈道飛彈條約》的協議。⁵⁷另一方面又準備聯合研發彈道導彈防禦系統。中共從俄羅斯進口了數套類似美國愛國者飛彈防禦系統的 S-300PMU-1 反飛彈防禦系統，據說此系統和後續的 S-400 性能均超越美製同級武器，且中共也自行研發了反飛彈防禦系統 KDI，並從俄國移轉了尖端軍事科技和購進先進武器。俄國則一方面修改軍事戰略，提高核武器的地位外，大幅增加國防預算，並加強高科技武器的研發，另一方面強化和中共的夥伴關係。

55. 一項是有關 F-16 戰機飛行員訓練和後勤裝備；另一項是目前台灣所使用的所有美式戰機、運輸機、教練機以及 IDF 戰機的後勤補給。請見尹慶耀，〈關於柯江會談〉，《共黨問題研究》，第 24 卷第 7 期，1998 年 7 月，頁 31。

56. 發展 TMD 和 NMD 的戰略價值，可約略劃分為兩方面來說明：首先，可迫使敵國彈道飛彈威脅失去價值，減少其對政治、經濟、軍事目標的打擊；其次，成為在進行「反飛彈科技擴散」談判時的有效籌碼。

57. 俄國外交部副部長聲稱：「若美國退出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條約，俄將在軍事方面採取回擊措施」，且威脅俄將退出美俄第一和第二階段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

探究中共反對美國TMD的理由，除防止美國藉此在軍事上獨霸全球外，最重要的就是擔心一旦美國把台灣列入其「戰區飛彈防禦系統」的涵括範圍內，會形成美台的「準軍事同盟」，屆時就代表了外國勢力公然干預台灣問題，昔日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勢必重現，日本憑藉著美日同盟也會伺機介入，情況將更複雜。另外，中共也反對美國眾議院通過的《台灣安全加強法》，認為該法是繼《台灣關係法》後第二部規範美台關係的法律文件，一旦該法案成為法律，將使美國對台軍售擺脫《八一七公報》的束縛，使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變成具體的法律條文。屆時不論台灣是否已加入TMD體系，台美之間已成了準盟國，倘若台海發生事端，它就為美國武力介入提供了法律依據。⁵⁸

俄國則畏懼美國一旦研發TMD成功，將會破壞雙方核武平衡的態勢，致使中共及俄國核武失去威嚇力。故基於反對美國軍事獨霸的共同立場及受到1999年科索沃戰爭、第二次車臣戰爭的影響，「中」俄加強了軍事上的合作。1999年底俄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四度訪問北京，除了尋求中共對其發動第二次車臣戰爭的支持外，也與中共發表聯合聲明，指責美國的TMD是美國圖鞏固其戰略優勢之舉，⁵⁹並

58.〈解放軍報：「台安法」引發戰爭〉，《文匯報》，2000年2月15日，版A3。

59.在聯合公報中，雙方認為：「1972年反導彈條約締約國違反該條約建立國家導彈防禦系統，會對戰略穩定、有關裁減和不擴散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一系列關鍵性國際協議，以及對在這些方面取得的進展造成破壞性影響」。請見〈「中」俄聯合聲明〉，《文匯報》，1999年12月11日，版C2。另外，今年的1月中旬中共國防部長遲浩田訪問俄羅斯，在同俄國防部長謝爾蓋耶夫的談話中，雙方一致認為：「有的國家發展國家和戰區反導彈防禦系統，視為背離時代潮流的舉動，它不利於國際軍控與裁軍努力，將使核裁軍勢頭發生扭轉，引發新的軍備競賽，並將對二十一世紀全球和地區戰略平衡和穩定產生破壞性影響」。

譴責「新干涉主義」及反對台灣提出的「特殊兩國論」。

兩岸關係自從 1999 年 7 月李登輝總統提出「兩國論」後再度陷入緊張，面對中共不斷擴軍的國防壓力，台灣除了試圖加入美國主導的 TMD 外，也積極購買武器。去年台灣向外採購武器的金額高達 63 億美元，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而成為美國第二大的軍火購買國，由此不難想見「兩國論」給兩岸情勢帶來的衝擊。

2000 年 2 月 11 日中共向俄國訂購的一艘現代級驅逐艦「杭州號」穿越台灣海峽前往其東海艦隊基地，由於該艦具有先進的超音速反艦飛彈，故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視。⁶⁰2 月 21 日中共《一個中國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的公布，表明了其對儘速解決台灣問題的急迫感。在面臨其視為「台獨份子」的陳水扁有可能在 3 月 18 日的總統大選中獲勝的情況下，中共此時發表了白皮書，代表其對台灣問題的立場已逐漸強硬。而「杭州號」通過台灣海峽，一方面象徵「中」俄夥伴關係已不斷強化，雙方再動干戈的可能性大幅降低，讓中共和俄國得以將主要的軍力部署在東南方和西方，且雙方的軍事合作的主要目標已鎖定美國及其亞太的盟國與友好國家。另一方面就是給台灣警告，中共已有先進武器抗拒台灣的二代兵力，即「以戰逼和、以武促統」，以軍事實力威懾台灣在新領導人產生後儘速走上談判桌。同時表示具有相同處境的俄國也始終支持中共在台灣問題上的主張，⁶¹台灣不可心存僥倖。再者，適度的展示武力，不但可藉此突破美日安保同盟的戰略圍堵，從而嚇阻兩國介入兩岸紛爭的意圖(如現代級戰艦有「航母剋星」

60.關於現代級驅逐艦的性能介紹，請見〈現代級駛過台灣海峽〉一文，《文匯報》，2000 年 2 月 12 日，版 A5。

61.如今年的 2 月 28 日中共外長唐家璇訪問俄羅斯，在 3 月 1 日同俄羅斯代總統普丁的談話中，普丁表示：「俄國支持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支持中國實現領土完整」。請見〈唐家璇外長拜會俄羅斯代總統普京〉一文之報導，《人民日報海外版》，2000 年 3 月 2 日，版 1。

的稱號)，同時也可依靠此種「砲艦外交」作為後盾來處理其他國家與中共有領土主權爭議的問題，故日後中共在此類問題上的態度逐漸強硬乃必然之事。

肆、我國應有的作為與因應措施

一、積極參與亞太安全機制

所謂的「多邊主義」，是指與兩國或兩國以上的國家共同協作，以達成在外交、經貿、軍事等方面的政策目標。一般而言，多邊主義策略即強調透過多邊之手段來解決國際間之各種(經濟性及安全性)問題。因此，抱持此種論點的學者認為多邊主義非但不會挑起爭端，反而可以確保國際安全與穩定。多邊機構為國際間之各種類型機構，在亞太地區的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其類型主要有七種。⁶²此類機構根據一些行為準則，協調三個以上國家間之關係，藉由資訊之提供、交易成本之降低、互惠之促成、已發展一套衝突防制和衝突管理之機制，並有效達成與確保和平。我方應積極尋求參與此種機構的機會，以集體的力量來抵制中共可能謀我之企圖。

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曾提到：「亞洲國家間的領土、邊界爭端和有爭議的問題，應該根據有關國際公約，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反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故我方的主動出擊，一方面代表了愛好和平、願意與亞太各國為共同維持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而努力，另一方面，也可讓亞太各國〔肯定我方在維護兩岸和諧關係上所做出的努力，以襯托中共不斷對中華民國在軍事與外交上的文攻武嚇及打壓，對我國爭取國際友誼和援助極為有利。

62.請見謝昌生，〈後冷戰時期中共亞太多邊安全協作關係之探討〉，《共黨問題研究》，第24卷第12期，1998年12月，頁28。

二、加強台俄非軍事交流

台俄關係受到大環境的影響，一直難以有突破性的發展，再加上長久以來，我國的外交重心一直都放在美、日，故久而久之台俄關係不進則退乃是意料中事。隨著國際局勢的演變，各國之間的關係也重新調整和定位，而我國的外交政策也應該從全盤考量，從考慮台灣、美國、日本、中共之四角關係擴充到台、美、日、「中」、俄五角關係。

俄國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之一，又是科技大國，人力及物產資源均豐富，最重要的是一它是中共先進武器的主要供應者。目前威脅台灣安全的，就是中共的武力，就國際關係、地緣政治、軍事安全及經貿關係而言，吾人實不應如此地輕忽它。既然中共對俄國同台灣發展非官方關係不持異議，則我方不妨順水推舟，重點擺在與俄國的經貿和科技的合作。

在經貿方面，俄國民生工業不振，外來品充斥，我方可利用民生工業的強項，並鼓勵台商踴躍赴俄投資，一方面可使我國價廉物美的民生消費品打入俄國市場，另一方面也是呼應政府的「戒急用忍」政策，分散投資風險，將主要市場不再侷限於中國大陸，可說是一舉兩得。而俄國的原料及工業產品正好是我國所缺乏的，可見台俄雙方的經濟如同「中」俄雙方一樣，有很強的互補性。

在科技方面，俄國在航太科技、衛星通訊、軍事科技上有著領先世界的技術，尤其是軍事科技，似乎是我方應強調的重點。俄國的對台「四不」中的「第四不」只談到不對台灣供應武器，但並未提到不提供軍事科技，且中共對台灣同俄國發展經貿、文化、科技及體育方面進行非官方聯繫不持異議，其中「科技」的涵括範圍是很大的，同時也應趁機引進俄國人才，轉移俄國技術。

此外，我方應拓展與俄國各階層人士的交流，既可使其充分了解台灣目前的政經成就，同時也可順帶提醒其不斷軍售中共的嚴重後

果，並爭取其諒解和友誼。

三、發展兩岸信心建立措施

「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CBMs)是國家間可用來降低緊張局勢並避免戰爭衝突危險的工具。它並不是直接用解決已發生的衝突或對立，而是建立一條架構用來避免或降低由於不確定和誤解所產生的衝突或對立。它的功能在於增加軍事行動的透明度，以協助各國區分自己對於一個實在或潛在對手之意圖或威脅的恐懼到底有無根據，故它是有關對於事實的認知，並非單純事實本身。亦即經由相關措施與方法，使各方釐清彼此軍事作為的意圖，以避免不必要的誤會與對立，是預防外交的一環。⁶³

關於兩岸的軍事互信機制建立問題，更是困難重重。此一問題自從去年以來，就一直呈現「台北熱、華盛頓熱、北京冷」的情況。目前的辜汪會談對降低兩岸敵意似乎幫助有限，在中共不斷打壓我國國際地位的影響下，使得我國無法消除對中共的疑慮，中共也擔心台灣會隨時脫離中國而獨立。隨著中共的武力不斷增強，迫使台灣也相對增加軍費來因應，如果沒有適當的規範，雙方戰備狀況很可能會一觸升高為意外戰爭。但無論台灣如何高呼此一主張，中共的回應都強調：應儘速開展結束敵對狀態的政治談判，也就是說，只要進行政治談判，則一切都好談，這就是兩岸現今陷入僵局的癥結所在。我方目前除了應盡力爭取重開辜汪會談外，也應設法採取一些動作(如部分三通、減少情緒性字眼的使用)，儘量降低對方的疑慮，展現我方的誠意，不過這也要端視中共方面的反應而有所進退。

63.請見楊永明、唐欣偉，〈信心建立措施與亞太安全〉，《問題與研究》，第38卷第6期，1999年6月，頁2。所謂的「預防外交」，依聯合國前秘書長蓋里的定義，是指預防各方之間爭端的發生、預防既存爭端升高為衝突，以及預防已發生的衝突擴散之行動。

四、建立有效的嚇阻武力

雖說兩岸不宜開展軍備競賽，但在中共仍不放棄武力犯台，以及兩岸關係目前陷入低迷的情況下，維持一定的自衛武力是絕對必要的。台灣在軍隊數量不敵中共的情況下，力求「質量建軍」的發展方向大體說來是正確的，而這也要搭配高科技的武器及相應的管理體制。如今我國的先進武器似乎多偏向對外採購，而自力研發者少，這是一大不利之處，故中共報章雜誌曾多次譏諷台灣是用「洋武器」來自衛，武器方面以自力研發及仿製為主，配合適度的外購，才是正確的想法。至於我方是否要加入美國主導的TMD問題，一方面由於TMD技術迄今尚未完全成熟；另外，就是它龐大的研發費用，會加重我國的財政負擔；再者，中共會認為一旦台灣加入TMD，就會形成「美台準軍事同盟」，這就代表了「外國勢力公然介入台灣問題」，其反應必定相當激烈，且又時值政權輪替，由民進黨上台執政，故加入TMD的問題，有待我方仔細商榷。

伍、結語

「中」俄軍事交流帶動著「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不斷深化與發展，這也代表著：第一、在一段長時期內—也許是十至十五年，俄國都不會構成對中共的軍事威脅；第二、對中共政權而言，最重要的是將發展重心放在經濟，而非意識型態；第三、中共可能拒絕採取政治改革或減緩其發展步調。畢竟，失控的民主演變會使中共領導人頓時失去權力；第四、在單極世界中，中共若想崛起成為新強權，它勢必會繼續對抗和利用美國。

展望雙方戰略夥伴關係的發展，吾人須注意以下幾點：首先，中共與俄國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主要目的是尋求成為區域強權，以強化其國際地位，故學者阮銘曾指出：「共產中國第三代的外交戰略，是國內路線的延伸，可以概括為：一手經貿全球戰略，一手軍事

區域霸權戰略」。⁶⁵

其次，俄國與中共間仍存在許多雙方無法控制的政治與經濟暗流，而在未來均可能造成嚴重衝突。整體而言，「中」俄間穩定合作的關係對國際社會雖然有利，但兩國間權力如何平衡發展，特別是目前中共的強大，相對於俄國的衰弱，都令俄國對中共的崛起戒慎恐懼，且若日後俄國國力復甦，雙方如何定位彼此在對外政策中的角色和地位，也值得關注。

最後，「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近幾年來有加溫的趨勢，且針對性也日益明顯，目標就是美國的霸權主義。中共「國家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胡錦濤就曾表示：『「中」美關係發展的前景將是長期的緊張、對抗，「中」俄關係則以進入嶄新、全面友好、合作的時期』。⁶⁶目前「中」俄在國際事務上的共識日漸增多的情況下，雙方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是否有轉化成為政治、經濟、軍事同盟呢？關於此點，中共「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曾有一段耐人尋味的答案：『「中國」奉行不結盟政策，並不是不能修改的，如果地區形勢發生變化，美國霸權主義、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和平環境受到威脅，我們會做出改變的』。⁶⁷在此處就點出了「中」俄同盟的先決條件：美國霸權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歷經科索沃戰爭後，「中」俄均認為美霸權主義的企圖已顯露無疑，且已成為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主要障礙，而日本節節提升的軍力，又是「中」俄欲在東亞爭霸的眼中釘。一旦 TMD

64. Henri Eyraud, "From Confrontation to Partnership: Reviewing the Soviet/Russia factor in the Chinese strategy 1985-2000," *China Strategic Review*, Vol.3, No.1, Spring 1998, p.163.

65. 阮銘，〈共產中國第三代的外交戰略－經貿全球戰略和軍事區域霸權〉，《開放雜誌》，1999年5月號，頁39。

66. 羅冰，〈中共跨世界外交政策〉，《爭鳴月刊》，1999年11月號，頁13。

67. 黎自京，〈江擬「中」俄結盟制美〉，《爭鳴月刊》，1999年3月號，頁13。

成功地在亞洲部署，是否會影響該地區的權力平衡？「中」俄會不會因此再續前緣，締結「軍事同盟」？這些情況都是下一世紀國際舞台上將要上演的戲碼。一旦新冷戰出現，按照我國目前的處境觀之，我方應該傾向美國的一邊，如此一來，兩岸關係勢必又會惡化。故如何在同亞太地區的四強交往中運籌帷幄，伺機而動，成為被拉攏的對象，而非聽命行事的一方，正考驗著我方領導人的政治智慧。

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under PRC-Russia Strategic Cooperation Partnership Relation —What Should ROC Do ?

Ding-shu Wang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Russian
Studies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bipolar system has been broken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Relations among great powers were adjusted accordingly. PRC and Russia initiated multipolar system and become "strategic cooperation partners" to resist the "American hegemony". Through military exchanges between the PRC and the Russia Federat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PLA paced faster. The PRC's military capability threatens the structure of Asia-Pacific security, especially to Taiwan Straits.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is situation, Taipei should take more realistic actions. First, to protect Taiwan through international multilateralism and collective security system. Secondly, to strengthen the non-military exchanges between Taiwan and Russia. Third, to develop the CBMs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to remove the anxiety, reduce the enmity and avoid unnecessary conflict from misunderstanding. Last, Taipei should keep self-defense capability for deterrence if PRC is still unwilling to give up military actions toward Taiwan.